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

以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

王小平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跨海知识分子”研究的尝试

陈思和

王小平来信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希望我给她写一篇短序。作为小平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闻之欣慰,自然也愿意为她的论文出版写几句话表示祝贺。但是我还是应该先申明,其实我并不是写这篇序言的最适合的人选,而最合适的人选、也是研究台湾文学史最具权威的学者,应该是台湾师范大学的许俊雅教授,何况小平的这部论文,是在许教授的直接帮助指导下完成的。我虽然长期关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状况,对台湾文学也有一些兴趣,但毕竟是隔海相望,资料、信息以及对于环境的熟悉程度均不足以用来做深度研究。至今为止,我的能力还仅仅停留在对个别感兴趣的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解读之上,却没有能力作整体性的把握。也因为如此,凡有学生需要我指导其研究台湾文学的论文时,我总是能推则推,实在无法推辞,就转手介绍他们去台湾暂住一段时间,通过实地考察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通过查阅第一手图书资料文献,等待有了真实感受和独特体会,再来讨论如何写论文也不迟。就这样我依赖台湾同行们的相助,先后推荐介绍过若干名学生去台湾做研究,回来后显示的成绩都不错,也有学生获得学位后走上了研究台湾文学的工作岗位。王小平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为了帮助她写论文,我把她推荐给许俊雅教授。热情的

俊雅不仅推荐她申请了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赴台资助并获得成功，同时还动用了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为她设计研究课题提供了思路 and 许多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无私的相助，大约不可能形成这个研究选题。俊雅教授本人是一位对两岸文学都有颇多关注，并身体力行进行研究的学者，她关于两岸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追溯到乙未割台以来若隐若现的民间文化、翻译文学和通俗文艺，注视着两岸文人的交流和沟通，她对梁启超赴台书信的整理出版，对江亢虎游台杂记的考据，对黎烈文跨海著译全编的搜集整理，对近代台湾翻译文学的研究，等等，都是这个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对两岸学界都有震撼。小平的研究工作能够从一开始就得到俊雅的指点和帮助，这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青年学子中很少能得到的机缘，这部论著若有什么贡献之处，我想第一要感谢的就是许俊雅教授。

在这里先谢过了俊雅，再讨论这部研究论著的得失。这部博士论文原来题目叫《光复初期“跨海知识分子”研究：以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为中心的考察》，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平把经过修订出版的书名改为《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其实我挺喜欢用“跨海知识分子”这个名称来概括老一代从大陆赴台的知识分子，“跨海一代”，与后来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籍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与土生土长的台湾籍知识分子也不同，它是指与中国内地的文化（主要是“五四”新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血肉关联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光复后艰难地将“五四”新文化传统陆续传播到台湾。“跨海知识分子”的“跨”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词，这个动作，不是两只脚从“这里”跳跃到“那里”，而是一个有连接性的动作：是一只脚在“这里”，另一只脚却已经到了“那里”，通过这个动作，就把滔滔海浪相隔的两岸连接起来了。“跨海知识分子”的连接物是新文化，而不是日治以前台湾文化人所熟悉那套子曰诗云之类的国粹。“跨海知识分子”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其中也可以分成好几个层次和派系。如

本书所主要研究的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算是一派，是靠近鲁迅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派；也有胡适、傅斯年、林语堂等等，比较西化的“五四”自由主义派，后来以殷海光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和以聂华苓为代表的更年青一代的“跨海知识分子”，都属于接近胡适这一派系的承传，但又更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小家族；也有比较靠近国民党政府立场的一派知识分子，如张道藩周围的陈纪滢、尹雪曼、王蓝等，那又是另一种“跨海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当然还有一派自由的作家和学者们：苏雪林、谢冰莹、梁实秋、夏济安、林语堂，等等，林林总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群体，也是跨越海峡两岸、研究台海与大陆文化关系所不可避免的重要文化现象。可是，这种“跨海”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来由于政治的原因被人为地割裂了，在台湾的人们可能只了解他们后半生的活动，而在大陆的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前半生活动。这就使“跨海知识分子”都这么永远地“跨”在那里，两岸的人们知道他们踏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只脚，却不了解踏在那片土地上的另一只脚。现在随海峡两岸的解禁和三通，两岸文化互相了解、整合研究的条件逐渐成熟，有前瞻性、有胸怀的学者早已经在开拓这一块“跨海”的新垦地，许俊雅教授就是这个学术领域一面旗帜，她在台湾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把一些坐井观天、画地为牢、捧着腐鼠当珍羞的夏洛克式的学者抛在了后面。王小平能在这样一个方向中选择了“跨海知识分子”中一部分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初次整合了许寿裳、台静农和黎烈文的全传和他们在台湾薪尽火传、播种鲁迅精神的努力工作，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填补了我们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长期空缺的重要的领域。

我不是说，这部论著已经十分完美了。小平的研究工作还仅仅是第一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首先是，她所关注的还仅仅是“跨海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数量不多，但可以以此为基础慢慢地扩大开去，自成一个研究系列，从中去寻找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多元人文追求的某些规

律；其次是，即使在这三位作家的研究中，目前学术界所能够达到的认知程度也还是肤浅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许寿裳先生的了解一般就限于他对鲁迅精神的宣传、维护和发扬，至于他在现代教育、现代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树，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台静农先生和黎烈文先生也一样，他们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下成就卓然的大家，在多种领域里都有建树，但我们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整理出版一部资料完整的全集。这些工作随着两岸交流频繁信息透明以后都会慢慢做起来的，所以，我建议王小平要自觉做一个有心人，在这个学术的方向下大有可为地努力下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作出新的成绩来。

2011年1月11日于鱼焦了斋

绪 论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政治重心的不断转移、分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而由此带来的文化空间的变迁更对文学、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7年爆发的抗战无疑是政治、文化空间转换的关键时刻之一,陈思和指出:“抗战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地图发生了改变,文学也相应地分布在不同政治性质的三个区域: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1〕并认为这种文学区域的分割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原先的延安文学传统发展到整个内地,沦陷区文学的殖民主义特色在香港文学中得到体现,国统区文艺则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转移到台湾。“只有把这三块地区完整地串起来,才构成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状况。”〔2〕如果我们将战后的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现象、文学传统真正纳入20世纪文学、文化史的整体视野,而不仅仅是在文学史写作时进行简单的材料叠加,那么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或许会更趋深入。1949年后,原先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被重新划分,其中,对从

〔1〕 陈思和:《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第100—101页。

〔2〕 陈思和:《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展望》,《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国统区到战后台湾这一条线索的研究,不仅对于打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文化史视野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理解今天的许多现象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尽管由于政治、经济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台湾与大陆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但回到光复初期的历史节点进行考察,则会发现,中国自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所发展的许多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传统不仅在大陆得到传承,在海峡对岸也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复活、接续。在这一过程中,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的意义逐渐浮现出来。

1945年台湾光复,结束了日本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陈仪所主持的行政长官公署的成立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合法统治的确立。战后的台湾不仅要面临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变的挑战,更要面临文化心理的转向和回归。因此,在行政长官公署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中,“文化心理建设”成为与政治、经济建设并列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迫切需要下,大批知识分子渡海去台,参与到战后台湾的新文化建设中,而各种力量和声音的同时出现使得此时的台湾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混乱状态。但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的台湾来说,却同时也蕴育着生机勃勃的不同路向。尽管战后的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模式上都带有之前国统区的诸种种政策形态的痕迹,但政治空间的变动所产生的种种异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现实则是国民党政府本身亦无法料及的。在“中国化”与“启蒙化”的相互纠结与微妙对抗中,在一批渡海来台、接续“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光复初期的台湾逐渐孕育出具有自身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新文化发展方向,并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意义。其中,这一时期赴台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一群体,又可称为“跨海知识分子”,对此命名要做一些说明。这一命名涉及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在大陆时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文化取向,并具有一定名望、地位的文化人,而不包括那些到台湾后才渐渐为

文坛所瞩目的外省知识分子,如后来的夏济安、聂华苓等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前者来说,政治文化空间的变动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更大,同时他们也是经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深刻洗礼的一批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他们,“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在台湾以不同的方式被传播、接续,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道路选择也体现出更多的文化史、思想史意义,这正是“跨海”的内涵所在。因此,通过对他们的个案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文化脉络是如何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1949年后大陆内地的传承方式在延续,这对于丰富、完善20世纪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5年后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跨海知识分子从时间上划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随溃败的国民党政府迁台的知识分子;一种则是前文提到的光复初期(本书中的“光复初期”更偏重于1945—1947年,也即“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来到台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做这种时间上的区分,是因为这两批知识分子在来台动机、文化取向、政治理念等方面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他们日后的人生际遇也有所不同,所产生的文化意义亦不同。

先来看前者。当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溃败,随着党政中心的渐渐转移,一大批文化人也随之渡海来台。这一批知识分子中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群体:一种是在文化取向、立场上基本与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比如张道藩等人;一种是持自由主义立场,但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政治抱负、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如胡适、傅斯年等人;再一种则是始终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专注于自我的心灵世界,职业、写作形式等都较为自由的文化人,如钱穆、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自然,这种分类也并不十分确切。在很多情况下,文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譬如苏雪林无疑是属于第三类知识分子,但当五六十年代国民党政府有意识地

进行反鲁迅宣传时，她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恰好迎合了这种宣传，而国民党政府所提供的言论发表、出版的自由也为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具体的保障，这时两者的关系就起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就使得从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角度来进行划分时带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上而言，这批知识分子中较少有持左翼立场者，他们在赴台之后大多即定居于此，或出国，而不再有回到大陆者。

与之相比，本书重点论述的第二类知识分子群体则有着较大不同。他们实际上是在政治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来到台湾，其中许多人是倾向左翼的人士，或者说在文化立场、态度上极少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一致，而是秉承了“五四”新文化精神中较为激进的一面，在其早年的文化活动中也体现出积极、进步的政治思想。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形势变化很大，在一段时期内有着较此时大陆国统区更为宽松、自由的言论空间，但也在不断的打压中经历着萎缩与勃兴的反复。这批知识分子的赴台，既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文化理想的选择，同时也怀有着新文化的启蒙理想，渴望在台湾这块被殖民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土地上开拓新的文化空间，接续祖国文脉，而事实上，他们的活动也的确构成了战后台湾文化中最富于活力、也最具人文底蕴的部分。他们在台湾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并在后来的“二·二八”事件中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随后或死亡，或回到大陆，或滞留台湾，渡过余生。在后来白色恐怖的岁月中，留在台湾的群体也大多对公共政治保持着缄默，但其中依旧不乏有那么一些人，在艰难的岁月中守住心灵的一点辉光，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并默默耕耘，并以自己的实际影响亲身参与到战后台湾的文化建设中。正是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忽略战后台湾文化中重要的一种精神传统，那就是与“五四”新文化紧密相连的精神传统，它或许不像 20 年代的北京新文化运动那样振聋发聩，也未能在政治高压下产生出如 30 年代上海

那样的公共空间，但却深深扎根在台湾的现实土壤中，不断生长、繁衍，最终融入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意识中，成为在今天依然能够显现力量的存在。选择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活动、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中最能够体现出持进步立场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到战后台湾这一过程中的心理特点，也最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动是如何影响着前者的文化选择。如果说目前对 1949 年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的话，那么对从国统区到战后台湾这一条线索的研究无疑能够起到很大的补充、参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论及的“五四”新文化精神对“跨海知识分子”的影响亦有其特定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对 20 世纪中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对其文化精神指向的分析也是长盛不衰的话题。给“五四”新文化精神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困难的事情，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书中所论及跨海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传承，更侧重于其批判现实、追求进步的一面。陈思和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不凭籍政治权力，单凭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动起来的一场旨在改变时代风气的思想运动。启蒙凝聚起知识分子直面人生、干预社会的现实战斗精神，形成了所谓‘五四新文化传统’。”^{〔1〕}这一传统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并不是始终如一地以某种固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本书中探讨的从大陆国统区到战后台湾这一空间转变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五四”新文化精神，主要是一种关注现实、不断反抗威权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在这一文化精神

〔1〕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

的传统中,鲁迅精神是其集中的体现。光复初期,随同陈仪来台的文教班底中有着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再加上台湾本地文化界亦有比较复杂的情势,关于台湾未来文化走向的问题在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中引发了许多论争。这之中,有关于“中国化”与“启蒙化”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辩,有关于“五四”新文化精神现实意义的论辩,有关于鲁迅宣传的不同反响以及后来在《新生报》副刊《桥》上展开的对台湾新文学走向、新文化建设的思考等等方面的论辩。究其原因,战后台湾动荡的社会现实是引发这些论争和思考的重要背景。而在这些论争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包括对于不同政治势力的看法和评价,以及潜藏着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纠葛。在激烈交锋和不断的融合中,也有着某些共识的产生。事实上,对鲁迅精神的体认和标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沟通平台,光复初期的大规模鲁迅纪念风潮和宣传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一种现实批判的策略。这是研究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界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而在对鲁迅精神的解读和宣传中,那些富于抗争意识和现实战斗精神的部分是特别受到推崇的,这与其时的台湾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关系。而事实上,在光复初期,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宣传也同样偏重于这一方面,后来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中的《自由中国》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标举“五四”时依然强调的是其现实抗争的启蒙精神。这也是本书所探讨的重点。

在光复初期的跨海知识分子群体中,本书主要选择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三人作为研究的个案。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人,一方面是出于三人相近的文化理念,他们虽不属同代人,但却共同经受过新文化精神的洗礼,都与鲁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战后台湾的活动共同构成了新文化精神传统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文化背景不同,交游圈子也各有不同,与政治的关系更是迥异,因此在从大陆到台

湾这一文化空间转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道路选择、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别,在各自的群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意义,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精神内涵及其传承脉络的丰富性。

作为鲁迅的密友同时又是教育界的重要人士,许寿裳在国民党内的处境是颇为微妙的。他早年是宋平子、章太炎的弟子,归国后又追随蔡元培服务教育,在他的身上比较明显地体现出经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特征,这是既带有传统印痕又走向新生的一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化选择、政治立场也由此具有某种代表意义,但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的逐渐成形以及在教育、文化等领域愈加严密的控制使得富有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压制,许寿裳也不例外。可以说,光复初期的台湾对他而且是一个充满新生希望的有待开拓的文化空间,他在台湾的三年时间内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许寿裳在赴台后任台湾编译馆馆长,作为鲁迅的密友,他在组织馆员编写了大量学校教科书及各类读物之余,还陆续写下了一系列纪念与宣传鲁迅的文章,对于宣传、介绍鲁迅起了先导的作用。正是在许寿裳等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台湾掀起了传播鲁迅的风潮。许寿裳积极的文化活动使他成为光复初期进步文化界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然而另一方面,许寿裳也不得不应对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不同声音。尽管台湾首任行政长官陈仪对左翼文化人包括许寿裳等人抱同情与支持的态度,但光复初期的台湾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国统区的党派之争,许寿裳不断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等到“二·二八”事件发生,陈仪被调离台湾,许寿裳主持的编译馆亦随即被裁撤,而后来台任教。然则,正当许寿裳重新回到教育界,开始认真擘划系务,将台大中文系逐渐引上轨道之际,却突然在家中被杀害。许寿裳的死,不仅留下了永远难以说清的疑团,更对当时渡海来台的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文化界一时喑哑沉默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战后台湾鲁迅传播的

中断。

大力宣扬鲁迅精神是许寿裳来到台湾后最为积极的文化活动之一。在此期间,作为鲁迅的同龄人和密友,许寿裳写下了一系列回忆鲁迅的文章,成为日后鲁迅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在这些文章中,许寿裳不仅披露了鲁迅的生活细节、行为思想等种种,更在深情的缅怀之外抒发个人心曲,由此可以说,许寿裳在宣传鲁迅的同时也是在宣传自身之根深蒂固的启蒙思想。除了鲁迅之外,作为传记家的许寿裳对生平最为亲近、敬服的二师二友的其他三人(宋平子、章太炎、蔡元培)均有文章或相关著作发表,或追忆或评述,而在这些追忆和评述之中则同样可以体察作者本人的情志、意趣。而其中所体现的以浙籍文化人为代表的近现代转型期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亦是把握许寿裳的文化史意义的重要关键。作为身兼士人理想与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的近代浙籍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许寿裳的身上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传统士大夫在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变化。早年参加国民党并长期服务教育界的经历使得许寿裳更多地渴望通过在政府任职来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事实上,当获得开明而有力的支持时,这种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但现代中国政治的诡谲多变使得其愿望最终落空。抗战爆发后,随着党化教育模式的日益加重,许寿裳与政府教育界高层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到了抗战中后期,他基本上不再担任比较高的职位。如果说,许寿裳曾经在二三十年代想要通过在政府的任职以及追随比较开明的教育界高层人士来实现自己的文化抱负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的历练,他已经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他更多的是通过编译馆的具体工作和文化宣传,试图通过“广场”的呐喊来达到接续“五四”传统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许寿裳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场意识“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

间运动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1〕

在同期赴台的跨海知识分子中,与许寿裳的活动有较大不同的是台静农与黎烈文。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两人都很少涉足公开的文化宣传,而是埋首于书斋,致力于教学、翻译等,一直延续到“解严”后时期。尽管政治的动荡很快使得光复初期的丰富文化空间趋于萎缩,短暂的众声喧哗过后,台湾转入了政治高压期。而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台后,台湾原先与“五四”新文化紧密相连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更是不断被压制,渐趋喑哑。然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在台湾并没有消亡,而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潜隐于民间,并构成战后台湾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流脉。这与跨海知识分子默默的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台静农在1920年代初期是深得鲁迅赏识的新文学作家,出版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有四篇小说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他到了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执掌中文系达二十年之久,后半生以学术研究、书艺名世,连他的学生都甚少知道其早年的新文学创作经历,而台静农本人则也绝少提起。在新文学作家和学者之间,台静农最终选择了后者。这里既有政治的因素,又不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尽管台静农早年在北京期间曾有过相当激进的活动,但同时也受到北大国学门风气的影响,在现代教育体制支撑下的学术研究机构中潜心问学,这使得其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形成特殊的交游圈,这本身就体现出“五四”新文化丰厚的底蕴与包容性。应该说,在早年的台静农身上就已显现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自我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在后来的战乱岁月中,这一点辉光亦成为他后来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书艺诗文创作的契机与支撑,也搭建起一座通往自由心灵的桥梁。对于一位曾参与筹备“北方左联”、陪同鲁迅“北平五讲”、并曾三

〔1〕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第141页。

次入狱的新文学作家来说,在台湾忧乐歌哭的后半生究竟是不得已的人生转向,抑或是生命境界的深化,实在难以说清。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的不断逼压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新文化传统自身蕴涵的矛盾与多面性或许更为深层和隐蔽。尽管台静农的后半生褪尽凌厉而归于平淡,但他始终不是一位纯粹书斋中的学者。在他执掌中文系的数十年间,从系务筹划、师资聘任,乃至课程设置、提携后辈学生等诸种情形,隐然仍可见到当年“五四”后的北大风范,今台大台文所所长柯庆明(台静农的学生)就直言“台大中文系是继承了北大的学风”〔1〕。而研究台静农书艺的学者也在其铁钩银划中觅得种种吞吐哽咽之意,其《中国文学史》及有关晚明文学史写作的手稿更有除学统承传之外的心曲流露,可以说,作为一个“岗位”型知识分子,台静农是在以其生命实践着当年“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的理想,虽然这种表达后来日趋隐曲,但却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另一种承传方式。

黎烈文真正在文坛上为人瞩目是在1930年代初期主编《申报·自由谈》的时候,也正是在此时,他与鲁迅有了密切的往来。作为鲁迅晚年亲密的年轻朋友之一,在黎烈文身上体现出来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是与鲁迅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紧密相连的。留法七年对黎烈文的影响很大,他终生的翻译几乎都集中在法国文学,深得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和气质的精髓,而主编《申报·自由谈》开启了将这种民主、平等的自由主义追求与中国的现实土壤相融合的道路。可以说,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进入了“五四”新文化的语境。而他与鲁迅的结识更为进一步加强这种融合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外在推动力。在鲁迅1930年代的文化活动中,新闻出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此时,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围绕在鲁

〔1〕 笔者采访柯庆明所得。

迅周围,如巴金、胡风、黎烈文、黄源等人,他们在政治上基本持自由主义立场,在报纸杂志、书店担任编辑、翻译等职务,努力实践着新文学精神。陈思和曾经把这批青年作家和编辑称为“文学新生代”：“他们年纪相仿,都充满了热情和理想,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仿,对当时的黑暗环境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中少数是左联成员,更多的是站在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他们几乎都是从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从事喜欢的文学事业的。”^{〔1〕}如果说,编辑《自由谈》时的黎烈文对自我的期许是定位在“广场”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立场,那么,抗战爆发后,广场的言论空间开始逐渐萎缩,他后来主编的《中流》等也被迫中断。到福建后,在陈仪的支持下,黎烈文在短时间内将改进出版社建成为大后方为数不多的高品质出版机构之一,但随着形势的恶化最终还是走向没落。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新闻出版业的一时繁荣吸引了黎烈文。他初到台湾是任职于《新生报》,这是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报社,也是战后台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言论桥梁,黎烈文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当年主编“自由谈”时的文化理想。然而,尽管陈仪是比较开明的长官,但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空间已经与1930年代的上海有很大不同。在经历一而再的挫折后,他终于意识到了“广场”价值在现代中国的虚幻性。在辞去《新生报》的副主编职务后,他再也未曾涉足新闻出版界。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黎烈文不再过问外界事务,在台大开设了法语和法国文学两门课程,教书之余则埋头于法国文学的翻译。教书和翻译不仅寄托着他个人的理想,也对其时的学生影响颇深,台湾现代主义作家王文兴在回忆自己走上创作道路时,就曾多次回忆起受到黎烈文翻译作品的很大影响。夏济安等人创办《文学杂志》时,黎烈文也是作者

〔1〕 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第5页。

之一，而对于学生辈的白先勇、王文兴等人所办《现代文学》，黎烈文也给予热情支持。因为曾经是“左翼文人”的关系，黎烈文到台湾后言行比较谨慎，连最亲近的学生也很少谈及政治，对于早年的经历更是绝口不提，但在其翻译作品、文章中还是处处可以见到一个持坚定启蒙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相比前半期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而言，黎烈文在台湾的生活确是由绚烂转入了平淡，或者说，他由“广场”型知识分子转入了对个体岗位的体认与坚持。在黎烈文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现实面前的痛苦、迷惘以及最终不得已的转向。

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中价值取向体现出更为丰富的特征。对此，陈思和曾经以庙堂、广场、民间三个概念来分别阐释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这三种价值取向中，不仅仅包含着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定、选择，也反映出“五四”新文化精神本身的内在复杂与多面性，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划分可以使得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考察更为透彻。但另一方面，但这三种价值取向之间亦并非相对孤立，而是随着时代、社会氛围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可以体现出共同的倾向，而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亦有可能会产生改变，甚至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因彼此缠绕而呈现出多面性特征，这在本书所要探讨的三位知识分子的身上有着比较集中的反映。在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的身上，我们即可以看到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层面之间的纠葛与转换。如果说，许寿裳是从“庙堂”走向“广场”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台静农、黎烈文则是在经历了政治现实的不断逼压以及内在心灵世界的转化之后，终于在民间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所在，以一己之所长将精神流脉默默传承下去。“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